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140)

唐代的歷史記憶

廖宜方 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中華民國佰年五月

第四節 唐代後期的時代認識與歷史鏡像

人的歷史記憶往往因其所處的時代環境而有所變化，尤其人的時代區分論，往往與歷史認識的內容互相作用。第三章將論及隋唐之際士人對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定位，面臨末世論與退化論的陰影。但至玄宗朝，朝野君臣已經肯定唐朝可繼漢承周，擺脫唐初陰翳的思想氣候，代之以高昂的信心。此一變化透露時代認識與歷史認識互相作用。隨後的安史之亂不只改變李唐帝國的格局，同樣影響唐人的古今關係論。³⁴⁶本節嘗試考察安史之亂的變局如何形塑皇帝、藩鎮與士大夫的身份認同與歷史認識。以皇帝來說，自我評價明顯下降，嚮往的典範不再高遠。在唐代前期，太宗以堯舜為帝王典範，高宗等也多以上古治世為理想。但中唐以降的皇帝甚至不認為自己可以比得上漢文帝，何況堯舜。他們不像太宗、玄宗，擁有平視聖王的自信。可見對中晚唐的皇帝來說，「古代聖王」顯得更遙遠了。

第二節介紹「皇帝王霸」這套兼有政論與史觀的論述，論及初唐皇帝多半以「皇道」、「帝道」為治國的目標。但在安史亂後，「王道」、「霸道」的價值與地位日益提昇。身為五霸的齊桓晉文、主張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管仲分別受到推崇，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們差可想像，對當時的人來說，「春秋戰國」可能成為有些士人理解時代的歷史鏡像。而且在皇帝王霸論中，「時」為其關鍵的概念：各個時代有不同的性質，統治方針隨之改變。因此如何面對安史之亂這場巨「變」，如何定位所處時代之「時」，主張「霸道」、

³⁴⁶ 同樣探討唐人的「古今關係論」，本章所論與瞿林東不同，見〈魏晉隋唐間的古今關係論〉，《東吳歷史學報》18（2008）。

推崇管仲，正是有些人因應「時變」而提出來的答案。對藩鎮而言，安史亂後的新局勢，使得強大的地方藩鎮以春秋五霸中的齊桓、晉文自許。至於朝廷士大夫，為了解決關鍵的財賦與軍事問題，轉而推崇主張富國強兵的管仲為典範。簡言之，藩鎮與朝野士人對所處時代有未見於唐代前期的新感受與定位，以「春秋戰國」這段歷史作為時代的鏡像。在學術上，島一研究中唐新春秋學，指出顏真卿、獨孤及、趙匡等人或從《春秋》的延長來理解現實、或從《春秋》尋求現實的規範。因為安史之亂，過去歷史上記載的君臣、父子弑逆等問題，如今化為現實。新春秋學即企圖在此一無道世界中重建秩序。³⁴⁷此一看法亦為本文所論之旁證。

唐代後期皇帝自我期許的下降

安史亂後，很難再發現像太宗、玄宗這樣追慕聖王治世的皇帝，或擁有高昂的自我期許。太宗之後，高宗同樣重視自己的歷史地位，至少兩次問臣子曰：「外間以朕方自古何天子也？」「今天下少事，求之前史，擬之何帝？」結果魏貞宰答曰：「周之成康、漢之文景」；高季輔對曰：「漢之文景、周之成康」。³⁴⁸魏、高兩人的回答很巧妙，皆以周、漢兩朝繼開國君主後第一個治世作答，符合高宗繼太宗之後的地位。但唐代後期，皇帝的自我期許和評價明顯下降許多。中唐李絳曾問憲宗：「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結果憲宗回答：「朕安敢望文帝？」³⁴⁹白居易也常舉漢代史事為例，〈策林〉中多處徵引漢史。對策亦云：「臣觀自茲已來，

³⁴⁷ 島一，〈中唐春秋学の形成〉，《東方学》（東方学会）93（1997）。

³⁴⁸ 《冊府元龜》，515：5847、320：3623。

³⁴⁹ 《新唐書》，152：4840；李絳，〈陳時務疏〉，《全唐文》，645：3854。

天下之理，未曾有髣佛於漢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佛於賈誼疏者……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³⁵⁰論取士之事曰：「漢文之明也，海內已理矣……陛下視今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乎？」³⁵¹漢文帝是節儉的典範，肅宗、文宗與宣宗皆因此稱引、自比或被擬為漢文帝。³⁵²但李絳、白居易所指，與皇帝的節儉無關，而是唐帝國的內外處境。³⁵³

與太宗、玄宗放眼上古、平視聖王的意態相比，憲宗的態度比較平實。文宗的自我評價又更下降。他在甘露之變後問鄭覃：「試諭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³⁵⁴結果李石勸勵文宗：「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史傳記載李石的動機為「欲彊帝志使不怠」，猶如魏徵希望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然而文宗的自我期許日趨低落，難以振作。他和李石在開成元年（836）論及宋申錫的政治冤案云：「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³⁵⁵開成四年（839），文宗和學士周墀對話如下：

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報、

³⁵⁰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白居易集箋校》，47：2845。

³⁵¹ 〈近日內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白居易集箋校》，58：3327。

³⁵² 肅宗事見《冊府元龜》，56：592；文宗事見《新唐書》，163：5028；《冊府元龜》，56：593；宣宗事見《冊府元龜》，56：593。

³⁵³ 相關研究見王子今，〈唐人歷史意識中的「文景之治」印象〉，《人文雜誌》2004年第5期。

³⁵⁴ 《新唐書》，131：4514。

³⁵⁵ 《新唐書》，152：4846。

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³⁵⁶

文宗自認不如漢朝諸帝，和甘露事變對文宗的打擊有關。晚唐昭宗外貶張濬的詔令云：「敢望皐、夔，共成堯日；庶幾孫、魏，粗及漢年。」³⁵⁷堯舜仍是對上古治世不變的想望，但勉強「粗及漢年」，反映晚唐君臣對時代的真實觀感。從憲宗、文宗的自我評價來看，唐後期的帝王不像前期諸帝對聖王有高遠的想望，不再遠擬上古、動輒堯舜三代，而是從型態與歷程比較接近的漢朝來看待自我。文宗和宰臣楊嗣復另有如下對話：「朕在位十四五年，無功無德，幸遇天下無事，固不敢望貞觀、開元。」嗣復曰：「自古帝王但能認得所遇之時即好。」³⁵⁸文宗不復當年「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覩今日之事，即往往憤氣填膺」的意態。³⁵⁹自德宗、憲宗以降，朝野君臣不復前期自信與樂觀，時代認識也影響歷史認識。權德輿序陸贄之文集曰：「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³⁶⁰白居易晚年居洛，歷覽古今詩人及其作品，發現「觀其所自，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因而認為：「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³⁶¹在唐代前期逐步形塑、在玄宗時達於高峰的盛世觀感，也隨安史之亂一去不返。

³⁵⁶ 《新唐書》，207：5874；《資治通鑑》，246：7941。

³⁵⁷ 《舊唐書》，179：4660；〈貶張濬鄂岳觀察使制〉，《全唐文》，90：564。

³⁵⁸ 《冊府元龜》，314：3552。

³⁵⁹ 《冊府元龜》，46：501。

³⁶⁰ 《陸贄集》，附錄卷二，〈陸宣公全集序〉，頁814。

³⁶¹ 〈序洛詩〉，《白居易集箋校》，70：3757。

富國強兵、桓文管葛、王霸時變

唐代後期，帝國格局的變化讓士大夫對時代有新的定位。河朔藩鎮有如諸侯割據，彷彿重現春秋戰國的歷史鏡像。肅宗時劉晏致書房琯，論今日封建與古不同：「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³⁶²當時可能有以「封建」復古的辦法來討平安史之亂的動向。³⁶³德宗時朱滔等人「依周末七雄故事」，自命諸侯。³⁶⁴于頔任節度使，以為「今之方面，權勝于列國諸侯遠矣。」³⁶⁵在藩鎮勢力強化的情勢下，比擬地方節度使為春秋時尊王、稱霸的齊桓公、晉文公的言論，延續到唐末。比如文人劉太真「敘（陳）少遊勳績，擬之桓、文，大招物論」。³⁶⁶此時對「桓、文」的接受度不高，所以劉太真之論「為義士所訾」、「物議囂騰」。貞元年間武廟的爭議中，士大夫的言論中也有「聖人所以尊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呂」之說。³⁶⁷不過，士人張謂論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³⁶⁸似乎還保留一絲肯定的餘地。房琯之姪房式在蜀地「贊（劉）關之德美，比之劉備。同陷於賊者皆惡之。」³⁶⁹相較於三國的曹、劉、司馬，桓、文至少尊奉王室。可見安史亂後士大夫對涉及割據

³⁶² 《新唐書》，149：4793。

³⁶³ 許德楠，〈略論杜甫與天寶十五年之「制置」事件〉，《燕京學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新26期（2009）。

³⁶⁴ 《舊唐書》，141：3845；《新唐書》，209：5930；《資治通鑑》，227：7336。

³⁶⁵ 《唐語林校證》，6：576。

³⁶⁶ 《舊唐書》，137：3762；《新唐書》，203：5781；《唐國史補》，卷中，見《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頁176。

³⁶⁷ 《唐會要》，23：511。

³⁶⁸ 《新唐書》，225：6435。

³⁶⁹ 《舊唐書》，111：3326。

與政權正當性的比喻相當敏感。

至晚唐，士人似已普遍接受時代需要齊桓、晉文的人物。地方節度使亦往往以齊桓、晉文自許。昭宗時徐彥若對割據荆南的成汭說：「公專一面，自視桓、文。」³⁷⁰晚唐周式說服朱全忠曰：「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³⁷¹結果「全忠喜」。李振也諫朱全忠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³⁷²鼓勵全忠討伐劉季述。士人黃碣諫節度使董昌曰：「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³⁷³可見桓、文之說流傳至唐末。藩鎮既然以桓、文自擬，自然好奇桓、文的事跡。史傳透露了藩鎮武人對《春秋》感興趣的故事。比如唐末閻丘方遠在吳越干謁錢鏐，「談莊老之義，逡巡而罷。（閻丘方遠）退而歎曰：『彼英雄也，是不宜與談玄虛之道者。』翌日入謁，遂陳《春秋》，（錢鏐）因延之盡日。」³⁷⁴中原的李茂貞則「奏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臺臺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³⁷⁵可見「春秋戰國」的時代認識與歷史認識交互作用。總之，以霸業著稱的齊桓、晉文，其歷史記憶流傳於唐代後期的藩鎮間，成為藩鎮評估自己的實力、地位和野心的文化資源。

第二節述及唐初君臣以「霸道」為劣的態度，但安史亂後，「霸」

³⁷⁰ 《新唐書》，190：5484；《北夢瑣言》，5：98。

³⁷¹ 《舊唐書》，142：3891；《新唐書》，209：5965、5970；《北夢瑣言》，17：320；《資治通鑑》，262：8534。

³⁷² 《資治通鑑》，262：8541。

³⁷³ 《新唐書》，193：5561；《資治通鑑》，260：8462。

³⁷⁴ 《十國春秋》，卷89，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28：1553。

³⁷⁵ 《北夢瑣言》，卷2，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29：1636。

卻成為無法忽略的現實。上述齊恆、晉文皆春秋霸主，故上引言論多明言「霸者」、「霸業」。晚唐時，出現「霸」一語的頻率不小。比如羅隱有一則軼事，談到他久舉不第，某位道士勸他：「若能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³⁷⁶成汭率軍救援江夏，史傳稱他「稟奉霸主欲親征」，³⁷⁷此處霸主當即朱全忠。武將劉仁恭的軼事則稱他「南取鄴中，圖袁、曹之霸。」³⁷⁸宦官嚴遵美的軼事稱其人「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³⁷⁹另外士人張道古上表昭宗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³⁸⁰士人王超的軼事稱他「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可見袁、曹、孫、劉與司馬懿等漢末群雄亦被視為霸者。在這種時代認識下，若干士人也有新的自我定位。比如鄭準依附成汭，「常欲比肩陳、阮」。³⁸¹陳、阮指曹操記室陳琳、阮瑀，其意亦比附成汭為曹操。各地藩鎮擴張、建國，則被稱為「圖霸」。比如江彥溫的軼事言及「梁祖圖霸之初」；候翽的軼事言及「王蜀先主圖霸」。³⁸²總之，他們意識到這是「霸世」。

對藩鎮群雄而言，符合其地位與企圖的歷史典範是恆、文，統治理念為「霸道」，重要的歷史知識得自《春秋》。對士人而言，依其身份、地位與理念，人物典範是管仲。據元結〈管仲論〉曰：

³⁷⁶ 《十國春秋》，卷 84，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28：1549。

³⁷⁷ 《北夢瑣言》，卷 5，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29：1643。

³⁷⁸ 《北夢瑣言》，卷 14，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29：1641。

³⁷⁹ 《北夢瑣言》，卷 6，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29：1634。

³⁸⁰ 《北夢瑣言》，卷 5，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29：1623。

³⁸¹ 《北夢瑣言》，卷 7，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30：1657、1658。

³⁸² 《北夢瑣言》，卷 16，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29：1631；《北夢瑣言》，卷 5，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30：1682。

「自兵興已來，今三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³⁸³可見安史亂後，不少士人基於時代認識，在歷史人物的典範中，特別寄望如管仲者。所謂「如管仲者」，即具備富國強兵、尊王定霸的才能。³⁸⁴法家和「霸道」的理想受到重視。³⁸⁵調兵遣將、出征伐叛尤其需要財賦的支援，因此《管子》一書備受重視，編撰《通典》的杜佑即著《管氏指略》；所編《通典》不但以〈食貨典〉居首，典末更稱太公、管仲、李悝、商鞅、蘇綽、高潁六人「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³⁸⁶顯然評價極高。杜佑並非孤高的思想家，島一考察杜佑在中唐前後思想系譜中的位置，前有劉知幾、劉秩父子，同時期趙匡、沈既濟，以及古文運動前後諸子，在人性論、政治改革與社會思想上，有諸多共通之處。³⁸⁷副島一郎則指出杜佑與柳宗元在思想與觀念的共通與延續。³⁸⁸另外，德宗時人盧景亮認為「足食足兵而又得士」，乃

³⁸³ 《次山集》，卷 8。

³⁸⁴ 先秦至西漢之間，管仲的不同形象、各家思想的評價以及時代變遷的影響，請見小林昇，〈管仲觀の變遷〉，《中國・日本における歴史觀と隱逸思想》（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3）。

³⁸⁵ 時代動亂、法家思想和「霸道」論有潛在的聯繫。Edwin G. Pulleyblank.（埃德溫・G・普利布蘭克），〈新儒家、新法家和唐代知識分子的生活〉，倪豪士編，《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閻步克考察南朝秀才策論考題，也指出當時有呼籲「農戰」、「王霸兼綜」的情形，見〈南齊秀才策論中之法家論調考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2 期。

³⁸⁶ 《通典》，12：295。

³⁸⁷ 島一，〈「通典」における杜佑らの議論について——食貨・選舉・職官を中心として〉，《立命館文学》（立命館大学人文学会）500（1987）；〈「通典」における杜佑の議論について——食貨・刑法を中心として〉，《立命館文学》502（1987）。

³⁸⁸ 副島一郎，〈「通典」の史學と柳宗元〉，《日本中国学会報》（日本中国学会）

爲政之要，因採黃帝以降相關事跡，著《三足記》。³⁸⁹從足食、足兵之說，可知其重視富國強兵的態度。晚唐杜牧承繼杜佑的法家思想傾向，在先秦諸子的人性論中，對荀子的評價最高。他重視兵學，注《孫子》，更推崇曹操：善於用兵、重視法治的霸主。³⁹⁰學者已注意到荀子和法家思想對中晚唐士人的影響，原因之一正是中晚唐與春秋戰國有近似之處。

第二節論及初唐政論多區隔皇、帝、王、霸，強調等差。但至中晚唐，相較於初唐大言「皇道」和「帝道」，霸道的價值與地位已受肯定。比如中唐韋處厚撰《六經法言》，以爲「三皇講道，五帝講德，三王講仁，五霸講義。所講不同，同歸於理」，³⁹¹將皇、帝、王、霸等而視之。李翱〈帝王所尚問〉認爲五帝與三王都「因時之變，以承其弊」、「各適其宜」，所以「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³⁹²即帝道同於王道。劉禹錫概括其友呂溫的生平思想，稱他「能明王道似荀卿」。³⁹³但荀子的王霸論不同於孟子，屬於肯定霸業的王霸論。前述李宗閔著〈隨論〉論述王霸，並非一味推崇管仲，論述重點在於王、霸各有其時，桓文「各以其時而自霸」，故執政需知時知變，不必法古。牛僧孺著〈辯名政論〉，亦出於「恐

47（1995）。

³⁸⁹ 《新唐書》，164：5043；《冊府元龜》，854：9950。

³⁹⁰ 愛甲弘志，〈杜牧の散文について——その思想的基盤の解明〉，《中国文学論集》（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9（1980）；高橋未來，〈杜牧撰『注孫子』について——兵学と儒学とをむすぶもの〉，《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学会）66（2008）。

³⁹¹ 《冊府元龜》，607：7001；《全唐文》，〈進六經法言表〉，715：4331。

³⁹² 《唐文粹》，卷48；《全唐文》，637：3798。

³⁹³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劉禹錫集箋證》，19：509。

後之爲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則潰潰然無指歸矣，請權而論之」。其文主旨甚明，即勸諫皇帝忽惑於「皇」、「帝」之名，以「王」、「霸」爲劣，執政者當務道適時，不可求名而失時。總之，「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王人、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³⁹⁴南唐劉津撰文記制置城池之事，引徐知誥之言曰：「非財何以聚人，非人何以求霸，非霸何以襲皇王之道」，³⁹⁵亦主張以富強爲先，循先霸而後王之序。唐代後期士人思考時變，重新詮釋王霸論，可謂先秦兩漢論王霸以來的一大發展。中晚唐推崇管仲、肯定霸道的思想課題，也爲北宋諸儒繼續爭論。³⁹⁶

安史亂後，可能有不少士大夫熱烈討論救時的「王霸大略」。《舊唐書》將張鎰、高適與暢瑒同收於一傳，三人都在安史亂中崛起，升至高位，「好談王霸大略」爲其共同特點。³⁹⁷中唐士人符載亦「以王霸自許」。³⁹⁸歷代宰相中被認爲近似管仲者，首推諸葛亮，尤其諸葛亮又曾以管仲自許，兩人一向都被列入良相之林。不過，兩人的定位都是「濟時之才」，³⁹⁹這又適合世變的時代背景。於是常與管仲連稱，成爲讚許人才的評語。在推崇管、葛、談論王、霸的思想氣候下，培育出新一代的士人。參與永貞革新的李景儉，「頗

³⁹⁴ 《文苑英華》，746：3898；《全唐文》，682：4114。

³⁹⁵ 〈婺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全唐文》，871：5374。

³⁹⁶ 近藤正則，〈『孟子』の王霸論及び管仲評価をめぐる北宋諸儒の議論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無窮会東洋文化研究所）復刊 58（1987）；王明蓀，〈王安石的王霸論〉，《宋遼金史論文稿》（臺北：明文書局，1988）。

³⁹⁷ 《舊唐書》，111：3326、3331、3332。

³⁹⁸ 《北夢瑣言》，卷 5，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18：959。

³⁹⁹ 《舊唐書》，179：4761。

閱前史，詳其成敗，自負王霸之略」，與呂溫最爲王叔文所重，待以「管、葛之才。」⁴⁰⁰而且史傳稱柳宗元等人自比「伊、周、管、葛復出。」⁴⁰¹伊尹、周公乃古代名相，地位無庸置疑，但管仲、諸葛亮才切合當時對人才的期望。王叔文敗前，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除了契合情境、表露心境之外，亦見他以諸葛亮救時治國的自許。⁴⁰²李翱致書張建封推薦士人，文中即舉齊桓公、管仲爲言，所薦士人包括李觀、韓愈、張藉和李景儉，並稱之爲「奇士」。⁴⁰³韓愈擬進士策問的考題，其中一則提到管仲、商鞅云：「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⁴⁰⁴韓愈闢佛老、楊墨，但似未排斥管、商，反而有肯定之意？李德裕上書論政曰：「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並引述管子書中尊君的言論。⁴⁰⁵李宗閔著〈隨論〉論述王霸，反駁孟子稱管仲「不足爲」之說，「微管仲，中國幾爲戎矣。而曰不足爲也，孰可爲之哉」；甚至「太公、管仲，并時而起，則吾未知孰前焉」。⁴⁰⁶另外，有位生於代宗年間的徐姓士人，任官只作到成都府司錄參軍，但他「幼覽墳籍史傳羣言，得活人匡國之術。尤愛管夷公、□葛□明傳，常偉其才曰：『大丈夫生乎世，得明哲之後，

⁴⁰⁰ 《舊唐書》，171：4455、135：3736。

⁴⁰¹ 《新唐書》，168：5125~6。

⁴⁰² 《舊唐書》，135：3736。

⁴⁰³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唐文粹》，卷86；《全唐文》，635：3789。

⁴⁰⁴ 〈進士策問十三首〉，《韓昌黎文集注釋》（上），2：158。

⁴⁰⁵ 〈論朝廷事體狀〉，《李德裕文集校箋》，10：187。

⁴⁰⁶ 〈隨論上下篇并序〉，《文苑英華》，760：3981；《全唐文》，714：4325。

當如楚莊公之□□。』」⁴⁰⁷晚唐高鉞為鄭居中撰墓誌云：「凡與其遊者，無不以管敬仲、諸葛孔明推之。」⁴⁰⁸可見管、葛的典範是各階層士人推崇、認同的對象。安史之亂不只改變帝國的政治構造，也為心靈和思想帶來相當的影響。但當時崛起的人物各有不同的取向，希望重建帝國秩序。第三章將論及儒學復興運動諸子的言論，他們也重視歷史上宰相和大臣的人物典範，但很少人提到管仲和諸葛亮。

武人與戰爭的歷史記憶

以上扣合時代的情勢，略述安史亂後李唐帝王、地方藩鎮與士大夫等不同身份的自我期許與歷史鏡像。以下從河北藩鎮和武人的角度，呈現另一類型的歷史記憶。德宗時田悅遣人遊說朱滔云：「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傑，欲掃除河朔。」⁴⁰⁹太宗時，秦皇、漢武可謂帝王的負面典範，但在河朔一帶卻是有魄力的英雄。代宗時辛雲京下葬出殯，諸道節度使遣人致祭，來自范陽的祭盤不但最高大，而且有機關動作，引人矚目。這些木偶有「尉遲鄂公與突厥鬥將之戲」、又有「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⁴¹⁰「尉遲鄂公突厥鬥將之戲」當取材自隋末唐初。晚唐殷侗建〈竇建德碑〉，云「自建德亡，距今已久遠，山東、河北之人，或尚談其

⁴⁰⁷ 〈唐故朝散大夫□成都府司錄參軍上柱國徐公墓誌銘并序〉，《全唐文補遺》第四輯，頁167。

⁴⁰⁸ 〈唐故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贈禮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滎陽鄭府君（居中）墓誌銘并序〉，《全唐文補遺》第八輯，頁156。

⁴⁰⁹ 《舊唐書》，141：3843；《新唐書》，209：5929。

⁴¹⁰ 《封氏聞見記校注》，6：61；《唐語林校證》，8：705。

事，且爲之祀。」⁴¹¹可見其人記憶之流傳。另外，安史亂時來自河北束鹿的張興據守饒陽，堅拒不降。他對史思明說：「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⁴¹²中唐時王武俊麾下武將楊孝直，其人「河朔知名，時人方之張飛、關羽。」⁴¹³晚唐昭宗，因「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⁴¹⁴從秦皇漢武的形象、楚漢相爭、三國英雄與隋唐豪傑的故事來看，河北藩鎮的歷史記憶偏重戰亂與軍事的題材。

總之，皇帝、文臣與武將各有不同的歷史記憶。畢竟文人與武人的氣質不同，仰慕的對象有異。武人心中的英雄多為歷代名將，如白起、韓信；他們對司馬相如或曹植等文人，恐怕從未知聞。而且中古前期各地戰亂，從而累積不少用兵之道的經驗、戰事成敗的教訓，這些「軍事史」、「戰爭史」肯定受到武人和將領的重視。關羽張飛、鄧艾伐蜀、杜預南征等名將與戰績都享有相當的知名度。唐代前期發動的域外征討、安史亂後中原一帶的軍事抗衡，更是留下了許多故事。這些故事有異於文雅風流的情調，充滿刺激、緊張的情節，突顯人物的豪邁性格，比如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張巡死守睢陽城、李愬雪夜入蔡州。這些故事才是武人的歷史記憶。俗文學正反映了這方面的歷史記憶。比如周紹良從佛教藏經中對《行

⁴³² 《舊唐書》，92：2945。

⁴³³ 《新唐書》，202：5767。

⁴³⁴ 《舊唐書》，148：3997。

⁴³⁵ 《梁書》，12：222。

事鈔》的注疏中證實三國故事已經在唐代流行。⁴³⁶張鴻勛曾列舉敦煌變文等作品中以「古時候」起始的例子，如「昔周國欲末」、「昔前漢欲末」、「昔劉項起義爭雄」等。這些涉及歷史題材的故事的時代背景竟然都是「朝代結束」之際。其他像是季布變文、韓擒虎話本等也常涉及朝代興替。⁴³⁷可見一般民眾從俗文學獲得的歷史記憶，偏重王朝末年、時代變亂、群雄鬥爭的刺激故事。

⁴³⁶ 周紹良，〈談唐代的三國故事〉，《紹良文集》。

⁴³⁷ 張鴻勛，〈從唐代俗講轉變到宋元說經〉，《敦煌俗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頁 120。

第三節 唐代後期的歷史認識與政治神話

晚近余英時研究宋人的「國是」爭論、鄧小南考察趙宋的「祖宗之法」，¹²⁰揭露士大夫對本朝歷史的關注以及「祖制」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此事不獨見於宋代，各個王朝都有皇帝建立的「故事」。這些「故事」或位在國策或法令的層次，或因行政而構成慣例，從而對王朝造成相當的影響。與黃金古代論相比，這些源自王朝歷史的祖制與故事屬於近現當代的歷史記憶。除了黃金古代之外，與王朝的祖制、故事對立者，還有前朝的遺制、或理想的「古制」。早在漢朝，就已出現「漢家故事」與「古制」的對立。早期的相關研究可見邢義田與澤田多喜男。¹²¹將「故事」與「古制」的爭論結合政治勢力的對立來考察者，有渡邊信一郎、保科季子和好并隆司；¹²²更細緻的討論見小嶋茂稔和渡邊義浩。¹²³有些「故事」

¹²⁰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6）。

¹²¹ 邢義田，〈漢代「故事」考述〉，《勞貞一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澤田多喜男，〈『漢書』所見〈故事〉攷（續）〉，《東洋古典學研究》（東洋古典學研究会）9（2000）。

¹²² 渡邊信一郎，〈中國的古典國制——以祭天禮儀為中心的禮法之成立〉，《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北京：中華書局，2008）；保科季子，〈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儒家礼制の受容——漢の伝統との對立と皇帝觀の變貌〉，《歴史と方法編集委員會編，《方法としての丸山真男》（東京：青木書店，1998）；好并隆司，〈前

的影響力跨越王朝的界限，比如渡邊信一郎認為前漢依古制而建立的「元始故事」，在後漢被重新組建，進而成為「古典的國制」。又如石井仁研究漢六朝期間，握有權力的大臣在禮制上的地位如何形成故事，因應中古前期朝代更替的現實。¹²⁴上述研究不只增益漢史、中古史與中國史的認識，在本書的研究課題上也有重大的意涵：在歷史記憶中，近現當代的「故事」也有相當重要的作用，有時甚至成為「典範」。本節即從「故事」的歷史知識與「典範」考察唐代後期本朝歷史認同的建構。認同包括認知與價值兩個部分，因此本章各節先後探討朝廷君臣對李唐本朝的歷史知識，以下更進一步論及「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等政治神話的建立。即唐代後期的史學發展和政權危機等因素，如何推動政治神話的建構。

國史教育：實錄和國史

在圖書文字的歷史記憶中，經史以外，唐代帝王的歷史教育另有來源，即閱讀李唐本朝帝王的著述與實錄。此事並非理所當然或出於偶然，魏晉南北朝並無其事，實與唐代史館的制度化以及實錄

漢後半期の古制・故事をめぐる政治展開》，《前漢政治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4）。

¹²³ 小嶋茂稔，〈後漢の国制における「州」の位置〉，《集刊東洋學》（中国文史哲研究会）95（2006）；渡邊義浩，〈後漢儒教の固有性——『白虎通』を中心として〉，渡邊義浩編，《兩漢の儒教と政治權力》（東京：汲古書院，2005）；〈後漢における礼と故事〉，渡邊義浩編，《兩漢における易と三礼》（東京：汲古書院，2006）。

¹²⁴ 石井仁，〈虎賁班劍考——漢六朝の恩賜・殊礼と故事〉，《東洋史研究》（東洋史研究会）59：4（2001）。

體的定型有關。¹²⁵唐代帝王閱讀實錄一事，張榮芳有所探討；¹²⁶池田溫比較唐實錄與日本國史，發現前者著重於敘述「非日常性的事件」，後者「綿密記錄平常的政務與人事」；由此或可猜測李唐皇帝閱讀實錄產生的歷史認識與感受。¹²⁷自太宗以降，李唐帝王多少了解本朝的歷史，如在唐代前期，太宗聽人誦《高祖實錄》、高宗讀《太宗政典》、睿宗讀《中宗實錄》等。¹²⁸玄宗時，武則天至中宗、睿宗朝的實錄已編修完畢。現存史料雖未盛談玄宗對李唐國史的興趣，但玄宗朝君臣並非不推崇太宗與貞觀之政，比如《初學記》所錄詩文：「太宗御制則升冠前代之首」。¹²⁹但相較於玄宗的自我肯定，他對太宗的尊崇稍輕。雖然此時吳兢撰《貞觀政要》，¹³⁰但較少人注意到他還編著《開元名臣錄》、《開元升平源記》。玄宗

¹²⁵ 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第四、五章；廖吉郎，〈唐代纂修實錄考〉，《國文學報》（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1（1982）。邱添生，〈唐代設館修史制度探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4（1986）。

¹²⁶ 張榮芳，〈唐代君主的史學教育〉，中興大學歷史系編，《第二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南：久洋出版社，1987）。

¹²⁷ 見〈唐朝實錄與日本六國史〉，《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

¹²⁸ 《冊府元龜》，27：275、《新唐書》，102：3986、《冊府元龜》，319：3612。

¹²⁹ 《初學記・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¹³⁰ 加藤聰認為，玄宗朝的政爭中，兩派人馬都嘗試從唐太宗的歷史記憶汲取有利於自己的政治資源。即主張「文學」的張說編纂《初學記》，收錄大量太宗的詩文；主張「吏治」的吳兢為張嘉貞與源乾曜一派，編纂了《貞觀政要》，見〈類書『初學記』の編纂——その太宗御製偏重をてがかりとして〉，《東方学》（東方学会）111（2006）。

在尚未改元天寶之前，即下詔「錄開元以來名臣事跡付史館」。¹³¹後者或為前者之史源。

如張榮芳所論，李唐帝王對本朝實錄產生濃厚的閱讀興趣，發生在安史亂後。不但在戰亂之後，而且處於史書殘缺的情境中。肅宗時，于休烈上奏稱：「《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燬皆盡。」¹³²于休烈建議下詔向民間購書，希望重建李唐皇朝的歷史記憶。幸好史官韋述在戰亂中保存家藏的國史，才維繫此一記憶。在史籍殘缺的情況下，于休烈編寫《五代帝王論》上呈。¹³³史傳稱當時「中興文物未完」，此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可惜「五代」的內容不詳。肅、代之際，李唐皇室正面臨內外軍事的挑戰。政權危機常伴隨歷史記憶的重建，韋述、柳芳和于休烈等人即為當時重建、維繫李唐本朝歷史記憶的重要人物。代宗時已重修完成《玄宗實錄》，元和年間，肅宗、代宗、德宗、順宗實錄相繼修畢。¹³⁴憲宗在元和二年（807）稱：「朕聽政之暇，徧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時事，竦慕不能釋卷。」¹³⁵憲宗自言「徧讀列聖實錄」，並非虛言。除了貞觀、開元之外，¹³⁶史傳也有憲宗閱讀肅宗、代宗、德宗實錄的記載。¹³⁷憲

¹³¹ 《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頁 713。

¹³² 《新唐書》，104：4008。

¹³³ 《舊唐書》，149：4008。此書內容不明，究竟「五代」何指，無法確定。

¹³⁴ 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頁 121~123、129。

¹³⁵ 《冊府元龜》，58：615；《舊唐書》，15：472。

¹³⁶ 《冊府元龜》，40：433，元和四年（809），憲宗「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

¹³⁷ 《唐會要》，64：1309；《冊府元龜》，76：828、158：1763、554：6350。

宗讀史頗精，他在元和中問李絳：「朕讀聖祖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及天寶衰亂，事出一主，而興替頓殊，何也。」¹³⁸至元和末問崔群：「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銳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後，稍似懈倦，開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¹³⁹如果沒有發生安史之亂，唐代前期的歷史記憶或許不致於如此突出？或將隨時代遞進而逐漸淡化、遺忘？

同樣熟悉本朝史事者，尚有文宗。他問：「天后時有起布衣為宰相者，果可用乎？」他對玄宗開元、天寶的治亂也有分辨，¹⁴⁰並要求大臣述說高力士的事跡。¹⁴¹他肯定德宗貞元初年的統治，¹⁴²批評順宗實錄不盡詳實。¹⁴³唐代帝王除了閱讀祖宗之實錄外，尚有「國史」可讀。「國史」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國史，如謝保成所論，指實錄以外，「前後相續的唐史」。¹⁴⁴廣義的國史則包含實錄，以及狹義的國史，甚至各種記載李唐本朝歷史的書籍。文宗閱讀國史，不只留意祖先的治跡，更一再下詔尋訪、授官給貞觀至安史亂間重要大臣的子孫，包括魏徵、長孫無忌、褚遂良、狄仁傑、宋璟、李元紘，以及顏真卿、杲卿兄弟。¹⁴⁵在這些詔敕中，文宗一再提到：

¹³⁸ 《冊府元龜》，328：3705。

¹³⁹ 《舊唐書》，15：470。

¹⁴⁰ 《新唐書》，174：5239、181：5346；《冊府元龜》，69：739。

¹⁴¹ 《次柳氏舊聞》，頁465。

¹⁴² 《新唐書》，181：5361。

¹⁴³ 《冊府元龜》，104：1139。

¹⁴⁴ 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頁125。

¹⁴⁵ 文宗，〈授魏謩諫議大夫制〉，《全唐文》，70：449；〈命訪長孫無忌裔孫制〉，70：448；〈授魏徵孫可則等官詔〉、〈追錄故中書令褚遂良等裔孫詔〉，71：454；〈褒賜顏從覽等官爵詔〉，72：462。

「朕每覽國史」、「詳觀列聖紀冊」。文宗對玄宗、開元年間歷史的興趣，稍後將再補述。凡此種種跡象透露中晚唐帝王之歷史記憶的重心，相當程度已逐漸轉移至本朝。

本章區別兩種歷史記憶：圖書文字與經驗見聞。但隨李唐王朝的延續，逐漸形成「朝代」的框架。第二、三節即從各方面呈現朝代框架對唐人歷史記憶的影響。在此框架下，圖書文字與經驗見聞產生微妙的關係。首先，隨時代演進，本朝歷史的時間距離逐漸拉長。玄宗於開元元年（713）即位時，離高祖武德元年（618）建國，已近百年。對生於元和年間（806~820）的文宗、武宗和宣宗而言，開元盛世已是百年之前的傳說。儘管時間距離逐漸拉長，但因在朝代的框架內，不致於因遙遠而顯得陌生、隔閡。但對本朝歷史之久遠者，已無法透過經驗見聞來獲得，於是圖書文字扮演重要的角色。近現當代史原本藉由經驗見聞的傳述，如今透過圖書來認識，使得兩種型態的歷史記憶相互補充、修正。比如太宗曾說：「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高煩善為相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¹⁴⁶憲宗讀《肅宗實錄》云：「大臣傳，多浮詞虛美」，¹⁴⁷透露以經驗見聞挑戰圖書文字的可靠性。另外，從唐代雜史、小說的發展，也可一窺圖書文字與經驗見聞兩種型態之歷史記憶的關係。謝保成指出這兩類作品皆前代所無，中唐後大量出現。¹⁴⁸無論雜史或小說，這些著述多半將個人經驗或各種傳聞付諸文字，以廣流傳。總之，在歷史記憶的版圖中，圖書文字的影響逐漸擴增。

¹⁴⁶ 《貞觀政要集校》，5：283；〈諸葛亮高頌為相公直論〉，《全唐文》，10：71。

¹⁴⁷ 《唐會要》，64：1309。

¹⁴⁸ 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頁304、316。

貞觀、開元的治國典範

唐代後期歷史記憶的焦點之一是貞觀、開元之治的意象。關於貞觀之治的歷史記憶，鄧小南與方震華皆有初步的探討。就歷史記載而言，鄧小南認為「《貞觀政要》一書真正進入李唐君臣的視野，是在中唐以後」。¹⁴⁹方震華將唐代前期「貞觀故事」的政治意涵放在武周代唐與玄宗反正的背景中，固然合理，但對太宗典範在玄宗朝的地位，所舉事例相當有限。除了吳兢撰《貞觀政要》以及韋述稱肅宗（時為皇子）貌類太宗之外，並無確證。方震華認為玄宗朝「貞觀傳統典範的典範地位也就確立」，並引「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的記載為證。¹⁵⁰早在中宗初即位，即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此或指涉王朝正統性的事項，比如「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¹⁵¹，但「永淳以前故事」並非貞觀傳統典範，實包涵高宗在位期間的措施。中宗再登帝位後，「時既改易，制盡依貞觀、永徽故事。」¹⁵²可見太宗、高宗並論，標舉李唐傳統。

鄧小南以為太宗典範的確立在中唐以後，不過欲了解祖宗典範，不能只鎖定太宗和《貞觀政要》，武則天也是值得研究的對象。比如金子修一考察中宗、睿宗以降詔敕對武后的記憶與評價。¹⁵³另

¹⁴⁹ 鄧小南，〈「祖宗故事」與宋代的《寶訓》、《聖政》——從《貞觀政要》談起〉，《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¹⁵⁰ 方震華，〈唐宋政治論述中的貞觀之政——治國典範的論辯〉，《台大歷史學報》40（2007），頁26。

¹⁵¹ 《資治通鑑》，208：6583、6589。

¹⁵² 《舊唐書》，50：2149。

¹⁵³ 他發現玄宗以降提及武則天的頻率大減，也從唐朝皇帝的繼承代數中排除武則天。相形之下，無論武則天建周或中宗復位，反而都比較強調和前朝的關係。

外，中唐以降朝野君臣稱引太宗、貞觀的言論固然不少，但方震華只鎖定「貞觀之政」，不談玄宗、開元，未免片面。實際上中晚唐君臣的言論中，開元之治往往與貞觀之治相提並論，言及玄宗的頻率或許稍低太宗；對玄宗在開元、天寶的統治也有高低不同的評價，對他引發安史之亂的禍患也有清楚的批評。但太宗與玄宗實為中晚唐君臣經常稱引的典範，因此只論貞觀之政，無法充份呈現中晚唐形塑本朝典範的政治文化。本節以歷史記憶為脈絡，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補充若干論證，合併討論貞觀與開元之治的政治神話。

貞觀時代是唐代最受推崇的政治神話，與貞觀相提並論者，依個別事例，偶有「武德、貞觀不難及」、「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等說法。¹⁵⁴但綜合來說，太宗與玄宗、貞觀與開元是最受推崇的君王與時代。依現存史料觀之，玄宗開元與太宗貞觀之治相提並論的言論，德宗朝以降，出現頻率大增。據說「貞元」的年號即寓有貞觀、開元之意。¹⁵⁵韓愈曾說：「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¹⁵⁶他還轉述裴均的談話：「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

就此而言，以玄宗即位為分界，先前為連續性的歷史，其後為斷裂性的歷史，見〈唐代詔敕文中的則天武後の評價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東洋史研究会）68：2（2009）。中文稿見〈關於唐朝詔敕中則天武后之評價〉，黃寬重編，《基調與變奏 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外交軍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8）。

¹⁵⁴ 《新唐書》，177：5281、149：4794。

¹⁵⁵ 「德宗初議改元，（李）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乃改號貞元。」《鄴侯家傳》，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15：767。

¹⁵⁶ 〈送王秀才序〉，《韓昌黎文集注釋》（上），4：391。

登良，不敢私違。」¹⁵⁷當時崔祐甫執政。「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¹⁵⁸白居易從貞元中到元和初的文章，往往並舉貞觀、開元：「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貞觀、開元之風，復見於今日矣」、「貞觀之大和，開元之至理」、「但陛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¹⁵⁹憲宗曾「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¹⁶⁰士人吳武陵致書吳元濟，稱憲宗「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¹⁶¹憲宗後的穆宗、文宗也都肯定貞觀、開元爲太平盛世。¹⁶²總之，太宗、貞觀雖然是地位最穩固的治國典範，但玄宗、開元也備受肯定。

文宗對玄宗時代的歷史，興趣更深。文宗生於元和四年（809），大和元年（827）即位，天寶十四年（755）的安史之亂已是數十年前之事，玄宗時代的故臣遺老恐皆已逝去。文宗已經不易從他人經驗見聞來認識歷史，他往往從各種文化產品，如詩、書、畫、衣物、

¹⁵⁷ 〈河南府同官記〉，《韓昌黎文集注釋》（下），9：491。

¹⁵⁸ 《新唐書》，142：4668、223：6354；《唐會要》，51：1046。

¹⁵⁹ 《白居易集箋校》，〈禮部試策五道·第五道〉，47：2861；〈請揀放後宮內人〉，58：3340；〈策林·達聰明致理化〉，64：3500；〈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47：2845。

¹⁶⁰ 《新唐書》，152：4836。

¹⁶¹ 《新唐書》，203：5789。

¹⁶² 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新唐書》，142：4669；文宗說：「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即往往憤氣填膺。」《冊府元龜》，46：501；《新唐書》，131：4514。「開成末……時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貞觀、開元之事」，甚至起用魏徵後裔魏謩，「朝廷拭目以觀文貞公之風彩。」《劉賓客嘉話錄》，《太平廣記》，卷187，轉引自《唐人軼事彙編》，24：1319。

樂舞等，想像玄宗時代的事跡。比如他因頌杜甫詩，「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台殿、百司廨署，思復升平故事，故爲樓殿以壯之。」¹⁶³宮中亭台懸有〈開元東封圖〉，他指圖中「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¹⁶⁴他還拿玄宗與楊貴妃穿過的「錦襖子」，比較過去與現在的侈儉。¹⁶⁵他不只下令編修《開元政要》，¹⁶⁶甚至對玄宗的〈霓裳羽衣曲〉深感興趣，令太常習曲練舞；有一年的進士考試，即試〈霓裳羽衣曲賦〉。¹⁶⁷可見歷史記憶不只透過圖書、口傳，詩歌、圖畫、樂舞等文化產品都能傳述歷史。「開元盛世」的記憶在中晚唐的形成與流傳，學者已有所探究。¹⁶⁸此一記憶多集中在長安，故王仁裕在蜀亡後至長安，「采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¹⁶⁹

中晚唐君臣稱引太宗、玄宗、貞觀、開元的言說非常多，無勞遍舉，大體上或爲君臣的對話與期勉，或見於士大夫的章表奏議，一如初唐太宗時君臣追慕上古聖王。然而有一點值得略作發揮。方

¹⁶³ 《舊唐書》，17：561；《冊府元龜》，46：502。但此事是否竟功，不無疑問。

¹⁶⁴ 劉禹錫，〈爲裴相公進東封圖狀〉，《劉禹錫集箋證》，17：424；《松窗雜錄》，頁1216；《唐人軼事彙編》，3：136

¹⁶⁵ 《冊府元龜》，46：501。

¹⁶⁶ 《舊唐書》，17：577。

¹⁶⁷ 《唐五代文學編年史·晚唐卷》，頁121、156；《冊府元龜》，569：6548；《唐闕史》，卷下，頁1351。

¹⁶⁸ 土谷彰男指出韋應物的〈驪山行〉屬於應制詩，〈溫泉行〉則是追憶之詩。無論如何，兩者都有助於構成玄宗時代的記憶，見〈韋應物「驪山行」詩考〉，《中國詩文論叢》（中國詩文研究會）25（2006）；另參陸揚，〈唐帝國的瓦解及遺產——一個老問題的新思考〉，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學術講座2010年第1號。

¹⁶⁹ 《唐五代文學編年史·晚唐卷》，頁259。

震華指出貞觀之治的治國典範，不只是帝王本人及其典章制度的成就，「其重要的輔佐大臣也成為記憶和歌頌的對象，兩相配合，便形成一種新的君臣典範。」¹⁷⁰此事尚可從記憶的文本化與歷史記憶的召喚來看。中晚唐言及貞觀、開元者，不少出自皇帝命官的詔敕。先舉一例如下，白居易所撰授裴廩殿中侍御史之制誥的內容如下：「敕：某官裴廩：貞觀初，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巡察，時以為能。朕思弘貞觀之風，故選御史官亦先其精敏剛正者。」¹⁷¹在白居易的中書與翰林制誥中，採取類似敘述模式者，並不罕見，¹⁷²屬於既定的模式之一。因為詔敕是皇權對下的溝通管道，朝廷重視臣僚對詔敕內容的感受。文中藉由引述太宗、玄宗時何人曾任同一官職，勉勵官員見賢思齊，與皇帝一同再造貞觀、開元之治。

白居易固然想望重現貞觀、開元之治，但此事不能只從其人的意圖來解釋。其實這與唐代政典、類書和史著的發展有關。自玄宗朝以降，徐堅、劉秩、杜佑、李吉甫等人，依周禮六官的架構，將唐代官制編入其中，並追溯其歷史淵源。除上述名家之外，其他士大夫亦有從事者。¹⁷³這些政典提供每個官職的發展脈絡，有時附載許多人物的言論、事跡。起草制誥的文人往往參考是書。元稹就說：「（白）樂天於翰林中書，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為程式……每有新

¹⁷⁰ 方震華，〈唐宋政治論述中的貞觀之政——治國典範的論辯〉，頁 31。

¹⁷¹ 〈裴廩授殿中侍御史制〉，《白居易集箋校》，50：2952。

¹⁷² 《白居易集箋校》，〈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48：2877；〈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48：2886；〈許季同可秘書監制〉，49：2914。

¹⁷³ 比如裴導撰《六官典故》，見裴佖，〈故右司禦率府錄事參軍裴君（衡）墓誌銘并叙〉，《全唐文補遺》第六輯，頁 110。

入學士求訪，寶重過于《六典》也。」¹⁷⁴此乃白居易之慣技，策林、百道判皆是。就連元稹自己也有類似的著作：「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¹⁷⁵今存《通典》、《唐會要》中殿中侍御史的部分，並未登載張行成的事跡，卻見於《太平御覽》一書，¹⁷⁶或許當時尚有其他著作可供參考。總之，政典、類書以及唐代官司壁記與題名等，留下各種痕跡，提供士人追溯官職歷史、歷任官員，從而召喚、利用過往的歷史記憶。其他著述亦提供助力，如前述言及的〈開元以來名臣事跡〉。¹⁷⁷另外，長期擔任史官的蔣乂在穆宗長慶元年（821）死時，已撰有〈大唐宰輔錄〉七十卷、〈凌烟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¹⁷⁸這些著作或為白居易閱讀與參考。白居易的時代離初唐已超過一百五十年，記得張行成的人可能已經不多。尤其考量到安史之亂使得宮中藏書蕩然，重建李唐本朝的歷史記憶為當時官方史家的重要目標。張行成等初唐官員的事跡或先由史官蔣乂整理錄出，再經白居易等撰寫詔敕者參考政典、類書、史著等書，從沉寂許久的歷史記憶中，重新召喚出過去歷史人物的幽靈，配合貞觀、開元之治的想望，豐富這些政治口號的內容。

小島浩之對玄宗「歷史像」的研究，與本章所論有互相發明之處。他認為貞元、元和年間的新春秋學派對沈既濟等史官有所影

¹⁷⁴ 〈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元稹集編年箋注》，頁 890。

¹⁷⁵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河南元公墓誌銘并序〉，《白居易集箋校》，70：3738。

¹⁷⁶ 《太平御覽》，卷 227，第三冊，頁 181。

¹⁷⁷ 《唐大詔令集》，81：468；《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頁 713。

¹⁷⁸ 《舊唐書》，149：4028；《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中唐卷》，頁 817。

響：使得沈既濟以春秋筆法批判武則天，否定武周的存在。其議論反映貞元、元和年間的歷史認識，其正統論的觀點亦為宋人所承繼。而且從這段期間到唐末有不立皇后的現象，或和此一史觀有關？他指出貞元、元和年間同時也是開元、天寶遺老尚存、傳述歷史記憶的年代，正是在這段期間，貞觀、開元等治國典範才固定下來。¹⁷⁹過此，只能像文宗一樣，從文化遺跡來憑弔了。

玄宗時代的歷史記憶乃是中晚唐文化史的重要課題之一。安史亂後，開元、天寶遺民的個人記憶與口述歷史甚受重視，比如史家韋述訪問高力士過去的舊事，修訂玄、肅兩朝的歷史。¹⁸⁰杜甫寫下〈江南逢李龜年〉、韋應物寫〈驪山行〉、〈溫泉行〉等；詩人還開拓出宮人詩的主題：「白頭宮女話當年」。¹⁸¹安置白髮宮人的背景場所，則為荒廢的宮殿，其中最著者為驪山的華清宮。竹村則行考察楊貴妃主題的文學史，論及華清宮因安史之亂、魚朝恩破壞和會昌毀佛等人為因素而急速衰落，從玄宗盛大行幸的別館，淪落為幽靈徘徊的廢墟。中晚唐華清宮詩中的殘破景像，或非憑空想像。相較於明月與山川恆久不變、自然草木從破壞中徐徐復甦，建築的

¹⁷⁹ 小島浩之，〈唐の玄宗——その歴史像の形成〉，《古代文化》（古代学協会）52：8（2000）。與此類似的現象，可參何冠彪，〈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明、清之際士人對萬曆朝的眷戀〉，單周堯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八十周年紀念學術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¹⁸⁰ 谷口明夫，〈柳芳と唐曆〉，小尾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編纂，《小尾博士古稀記念中国学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3）；郝潤華，〈柳芳《唐曆》考述〉，田澎編，《中國古代史論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

¹⁸¹ 詹滿江，《李商隱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第二章，〈舊宮人を詠じた詩〉。

衰敗卻透露人世的繁華一去不返。¹⁸²至於楊貴妃，固然被視為「傾國惡女」遭到士大夫批判，但另一方面也出現「絕世美女」的傳說，最後其為「被害者」的形象日趨穩定。簡言之，中晚唐對玄宗的歷史記憶有三項特徵：回憶已逝之榮華、盛唐遺跡的衰敗以及楊貴妃故事的再創作。¹⁸³前兩者形成懷古的氣氛，後者又更轉移到「悲劇愛情」與「亡國天子」的主題。¹⁸⁴中晚唐文人對玄宗時代的歷史認識，至此邁入新的地平線。跨越治亂與鑑戒的傳統觀念，從個人情感和失敗者的立場出發，以人性的理解來想像李唐之前諸王朝的敗亡。¹⁸⁵此一發展透露中晚唐士人的心靈世界相當複雜；¹⁸⁶對歷史人物的認同或批判，不可一概而論。文學創作競出新意，可能帶動思想觀念的變化，影響既定的史觀。¹⁸⁷

¹⁸² 竹村則行，《楊貴妃文學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3），〈中晚唐華清宮の零落〉。

¹⁸³ 竹村則行，〈「長恨歌」から『長生殿』に至る楊貴妃故事の変遷〉，《楊貴妃文學史研究》。

¹⁸⁴ 詹滿江認為李商隱詠亡國天子，既非懷古或詠嘆，而是揶揄和諷刺，見《李商隱研究》，第三章〈李商隱が詠じる亡國の天子〉。

¹⁸⁵ 大山岩根認為李商隱筆下的陳後主，並非單純的諷諭，而是將他描寫成一位與愛人別離的男性，使得陳後主無法被當作只是批判或哀惜的對象而已，見〈李商隱詠史詩に詠じられた陳の後主〉，《中唐文学会報》（好文出版，中唐文学会）14（2007）。

¹⁸⁶ 大山岩根研究李商隱歌詠北齊後主與寵妃馮小憐之詩，發現所用「玉體」、「橫陳」等詩語，襲自《玉臺新詠》，形塑出女子媚惑的意像，有豔情之意味，超越傳統詠史的格局，呈現「絕世美女的誘惑難以抗拒」的觀點，見〈李商隱「北齊二首」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学》（中国文史哲研究会）95（2006）。

¹⁸⁷ 大山岩根研究李商隱詠史詩中的四皓與楊貴妃故事，將李商隱的作品放在中晚唐同題詩歌的脈絡中來考察，尤能顯現不同文人的立場與觀點，見〈李商隱「四

不少學者考察中晚唐文藝作品蘊藏的歷史敘述、意像和密碼。比如中純子探討涼州詞、涼州曲的作品，指出中晚唐詩人意識中的「涼州」，和玄宗相連。¹⁸⁸因為自涼州傳來新奇的邊塞音樂流行於盛唐，但安史亂後，涼州落入吐蕃之手，使得空間上隔離的涼州，也變成時間上遙遠的涼州。又如元稹、白居易等為樂府古題賦予新意，貫注「諷諭」的用意，創作出「新樂府」。其中元稹〈董逃行〉以漢末動亂、董卓敗死為主題。傳統注疏認為元稹影射安史之亂、批判藩鎮問題。但長谷川真史認為文學創新才是元稹的本意。¹⁸⁹儘管有異說，但元稹〈董逃行〉詩意的詮釋，指出一個問題：政治詩與歷史詩的關係。因為「托古諷今」是中國歷史意識的一大關鍵，李商隱的詠史之作更是聚訟紛紜的焦點。比如伊崎孝幸認為晚唐詠史詩屬於知性的運作，而非涉入自己的感懷、融入所詠的對象；¹⁹⁰淺見洋二從敘述者的立場，認為李商隱的詠史詩異於懷古詩的既定格式，是以自己的觀點重新形構歷史的面貌。¹⁹¹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齋藤茂認為李商隱的詠史詩，寄寓當代發生的事件；把對唐

皓廟」詩について》，《東北大学中国語学文学論集》（東北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11（2006）；〈李商隱詠史詩考——玄宗・楊貴妃故事を巡って〉，《文化》（東北大学文学会）67：1、2（2003）。

¹⁸⁸ 中純子，〈涼州詞と涼州曲——唐代邊塞音樂管見〉，《中國文學報》（中国文学会）72（2006）。

¹⁸⁹ 長谷川真史，〈元稹樂府古題「董逃行」考〉，《中国文学論集》（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38（2009）。

¹⁹⁰ 伊崎孝幸，〈晚唐の詠史詩〉，《中國文學報》（中国文学会）69（2005）。

¹⁹¹ 淺見洋二，〈李商隱の詠史詩について〉，《文化》（東北大学文学会）50：3、4（1987）。

朝國勢衰頹的時代認識，融入詩中。¹⁹²比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其內容即敘述李唐國史，重點放在安史之亂至文宗期間的國勢衰頹與民眾困苦，蘊含政治批判的精神。¹⁹³此詩亦可謂之「近現當代史」。大山岩根從「詩型」、創作時期和表現技法等方面，區別其政治詩與詠史詩的差異。大山認為必須從李商隱的生涯挫折來理解他從政治詩向詠史詩的轉向，於是李商隱詠史的特徵之一是呈現歷史人物的悲劇性。¹⁹⁴

總之，安史之亂及其後果，帶給唐人巨大的「創傷」。此一創傷經驗不只牽動歷史記憶的內容，更激發諸多文化創作與反省，從而跨入新的地平線。由此觀之，安史之亂對唐宋士人心靈的影響，尚待進一步的研究。

¹⁹² 齋藤茂認為李商隱善用典故、比喻，並擁有獨特的價值判斷，能將一般價值觀中不對等的事物，在詩中予以對等，或加以逆轉，見〈李商隱「詠史」——歷史と現實の交差〉，伊藤漱平編，《中國の古典文學——作品選読》（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

¹⁹³ 大山岩根，〈李商隱「行次西郊作一百韻」詩について〉，《東北大学中国語学文学論集》（東北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9（2004）。

¹⁹⁴ 大山岩根，〈李商隱詩における「政治詩」から「詠史詩」への変化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学》（中国文史哲研究会）88（2002）。95